

評介賴昱錡著
《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做苦力了嗎？：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

宋冠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書名：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做苦力了嗎？：
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
作者：賴昱錡
出版社：東台灣研究會
出版時間：2013 年
頁數：249 頁

一、前 言

《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作苦力了嗎？：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一書，是由賴昱錡以其碩士論文改寫而成。¹ 該論文在寫作過程中，曾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臺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獎學金補助；論文完成後，又得到東台灣研究會的審定與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補助，於 2013 年 4 月出版。作者賴昱錡，是一位來自臺東鹿野鄉 Parayapay 部落的阿美族青年，族名「Angai」，是承襲自作者的伯父之名而來。

¹ 作者賴昱錡於 2012 年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畢業，其碩士論文題目為〈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做苦力了嗎？)：日治時代臺東龐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

「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是阿美族語，意為：「你今天做苦力了嗎？」，是日治時期阿美族人日常生活中的招呼語，就如同閩南語的「食飽未？(Chiah pá bōe)」與「有閒擋來企佗哦(Ū-ēng koh lāi thit-thō oh)」等「相借問(sio-chioh-mn̄g)」的語彙。由此可以說明：阿美族人的勞動身影，在日治時期的日人家庭、各種工事現場、輕便鐵道等場景，是如何普遍與隨處可見。

就國家統治、非原住民社會建立的角度來看，相較於臺灣其他地區，東臺灣的歷史縱深本就顯得相當短淺。東臺灣的規模性開發，要到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控制力進入臺灣東部後，才有所謂拓殖事業，與移民收容建設及其他一般事業的開發。這些基礎建設，往往需要投注非常大量的勞動力，而勞動力的來源，除了西部東遷漢人的少數挹注外，² 主要依賴東部土著人（東部原住民）的提供，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然而，過往一般有關東臺灣開發史的論述，若不是只強調漢人拓殖東臺灣的苦難經驗與豐功偉業，就是著重於討論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公、私營移民村，以及日本移民如何胼手胝足地投入產業的建設，對於阿美族人的開發貢獻卻一直為人所忽略。³ 《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作苦力了嗎？：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以下簡稱《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則一改前論，從阿美族人的立場出發，探討日治時期官方如何透過政策性的行政手段，取得並利用阿美族人勞動力，進而從事「強制苦力出役」的相關歷史問題，為向來無聲的東部原住民發出些微的歷史

² 雖然東臺灣的漢人人數在日治中、後期躍居東臺灣各族群人口數首位，但這些漢人絕大多數是製糖會社招募而來的佃工、雇工，或是一般的農民，其勞動力應付平日的工作已顯不足。詳情見：賴昱錡，《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作苦力了嗎？：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臺東：東台灣研究會，2013），頁174。

³ 賴昱錡，《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作苦力了嗎？：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頁14。

聲息。作者在本書對國家權力如何控管部落，而部落人民如何肆應與記憶等複雜的社會文化變遷議題，有詳實細緻的討論，讓我們可以同時看到大歷史與小歷史的整合與交會。

二、內容介紹

本書係以「勞動力」作為貫穿全文的討論架構，站在阿美族人的主體立場，以文字史料為主，輔以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討論阿美族人的傳統勞動力，如何從原本專屬於部落，到讓渡給國家，為政府所利用的歷史過程。作者進而指出，此一歷史過程不但是日治時期總督府的理蕃政策的一環，也和開發、拓殖、建設東臺灣的國策事業息息相關；而阿美族的傳統部落社會，在因應國家政策下又產生何種變遷與延續。

全書架構共為五章，扣除緒論與結論，其餘三章的篇名如下：第二章〈阿美族的傳統部落社會與勞動力〉，第三章〈國家力量的介入與阿美族役使政策〉，第四章〈勞動力釋出對阿美族社會文化的影響〉。

在緒論中，作者簡述其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並透過先行研究的回顧，指出「平地蕃」阿美族人對東臺灣的開發具有付出勞動力的重要貢獻；接著，再簡介全書的研究概念、方法與局限，以及章節架構與安排。

第二章〈阿美族的傳統部落社會與勞動力〉，係阿美族傳統部落社會組織與勞動力分配情形的概述。在本章中，作者整理口述與田調所得的恆春阿美部落資料，輔以日治時期人類學、民族學調查的民族誌，和相關研究成果如《蕃族調查報告書》、《臺灣蕃人事

情》等，集中論述傳統阿美族部落勞動力運作的組織型態，與勞動組合團體的運作模式，以及男性、女性勞動力的分工型態。

而第三章的〈國家力量的介入與阿美族役使政策〉，作者先透過《總督府公文類纂》、《理蕃志稿》與《林野調查報告書》等官方文書，點出居處東臺灣平原的「平地蕃」阿美族在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上的特殊性，進而分析被強制納入國家的阿美族社會變遷，以及阿美族人的勞動力如何自部落外流、進而供國家利用的過程。再藉由《廳報》、《統計書》、《管內概況與事務概要》與《高砂族調查書》等資料，闡述「強制苦力出役」的出現背景，係當局在施行一連串番社控管與土地收奪政策後，才「創造」出為數可觀的阿美族剩餘勞動力；並討論交由警察管理的運作情形，以及「訂出蕃人勞力供出」法治化的過程，因而確立了法治化的徵調流程。另外，也輔以時人著作，探討日治時期的社會輿論是如何看待「強制苦力出役」下，阿美族人從事「蕃人役夫」和「蕃人苦力」所衍生的種種問題。

第四章〈勞動力釋出對阿美族社會文化的影響〉，作者則以部落觀點與微觀史學方式，從阿美族男子年齡階級制度的創名制與Parayapay 部落耆老的記憶切入，探討日治時期阿美族人究竟從事哪些勞動類型的工作，以及勞動力釋出後對部落的傳統社會組織、金錢貨幣觀，以及婚姻與家庭繼嗣制度有什麼樣的影響。此外，作者更利用「日治時期蕃人勞動力」與「各類勞動項目別的歷年累計出役總人次」等統計資料，將日治時期東部各族群的勞動力表格化，透過圖表比較，清楚顯示：阿美族勞動力是居於東部眾多族群的首位，繼而剖析為何在國家役使蕃人的政策中，阿美族會是日本人勞役的首選。

在結論部分，作者除了概述本書各章論點外，也援引人類學者黃宣衛的研究理論，直指任何一個村落都有來自外在大社會的影

響，而研究者所應思考的問題便是如何找到聯繫村落與外在社會的「窗口」。⁴ 最後，作者再度重申與強調阿美族人在東臺灣開發中，是做為像燃料或水一般使渦輪運轉的原動力的殊勳者，不可忽略阿美族人投注於東臺灣基礎建設工作的重要貢獻。

三、綜合討論

本書的架構，是以東臺灣阿美族為主體，從勞動力的角度切入，探討日治時期官方如何透過政策性的行政手段，取得並利用阿美族人的勞動力，進而從事「強制苦力出役」的歷史問題，並探究勞動力釋出對阿美族傳統社會文化的影響與造成的變遷。

綜觀全書，作者透過爬梳與整理官方資料、私文書以及報章雜誌等三大方面的資料，指出臺灣總督府如何藉由「蕃社控管」與「土地收奪與限縮生活空間」等行政手法，「創造」出剩餘的勞動力，並收歸警察機關統制管理，形成專屬於警察系統的人力供給制度，以便投入公、私領域的勞動市場。作者並藉由田野調查與口述訪問，重建阿美族人對此一歷史的主觀記憶與認知，討論此一制度造成阿美族傳統部落社會文化的何種變動。

由於作者身為阿美族人，寫作主題又是阿美族，頗有「我手寫我史」之味。或許正因為如此，作者特別注重作為出役政策接受者的阿美族人，其自身的主觀認知與歷史記憶，此亦為本書最關鍵的特色之一。而作者將恆春阿美的村落歷史與文化變遷置放於大歷史的發展脈絡下討論，以勞動力使用作為國家與部落的銜接點，遂能討論強制苦力出役政策與阿美族社會文化變遷的關係。在此前提

⁴ 黃宣衛，《異族觀、地域性差別與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頁 10-12。

下，作者的寫作既有微觀的歷史關懷，又包含著大歷史的宏觀背景，讓讀者感受到原來「歷史」就在生活中隨手可拾。此外，作者在枯燥的史料編輯中，也適時穿插一些口訪紀錄，加上幽默生動的文字話語，使過往阿美族人的勞動經驗栩栩如生的重現在讀者眼前，也讓原本嚴肅的歷史，增添許多血肉。

本書的另一個特色，是作者對阿美族語言文化的熟悉，使其能夠掌握阿美族詞彙的內涵意義及其衍生與轉變，這也是作者的研究優勢所在。在看似簡單與有限的字詞中，經由作者的剖析，往往發掘出許多隱藏的訊息，像書中闡述 1921 年「Lasapad（木板）」組男子年齡階級組織的命名、命名原委與命名年代時，經作者抽絲剝繭地追索，不僅說明該組多數人員曾接受過日本政府的木工專長訓練，更補足官方文獻記載的空白；因為日治文獻，只有阿美族人勞動力如何運用的記錄，卻沒有阿美族人如何「訓練」的過程。⁵ 在研究方法上，更藉由剖析「男子組組名」的命名緣由，與熟悉族語的優勢，提示我們在研究無文字民族歷史時，還是有值得努力與切入的方式和面向。如此一來，或能突破文字史料的限制，開拓出不同的研究取徑，提升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以及發掘出更多不同歷史面貌的可能。

文中，還可看出作者對阿美族的人道關懷。作者不但寫出許多阿美族人被迫勞役的血淚，更直指強制苦力出役制度的弊端，像是阿美族人在新港漁港的工事現場，只因抵抗警察無理的脅迫，便遭日警用十字鎬擊傷腿部，以致終身瘸腿；而在當局強制出役的要求下，致使阿美族人因投入耕作的勞動力短缺，造成土地荒廢，然廢耕的土地仍需繳稅，但出役的薪資微薄，實無法支付稅金等等的情形。此外，作者更關心出役制度如何造成阿美族人社會文化的變遷；

⁵ 相關討論，見：賴昱錡，《Misakoliay kiso anini haw？你今天作苦力了嗎？：日治時代東台灣阿美人的勞動力釋出》，頁 206-209。

他指出，阿美族年輕男子權力因此擴大，衝擊了傳統的敬老美德與女系繼嗣，貨幣經濟亦取代實物經濟等。

但作者並非只是批判強制苦力出役制度帶來的負面影響，更關注日治時期阿美族人「異己觀」的形成，或也與出役制度有關。因阿美族青年與其他社群的互動經驗擴大，而得以凝聚「阿美族」同族意識；以及存在著所謂「殖民遺產」的遺留現象：有出役經驗者能習得工程技能，在戰後紛紛從事相關行業的背景。

最重要的是，作者亦注意到阿美族的地域性差別，指出不同區域的阿美族人有不同的勞務經驗，專精與處理的工作項目也有所不同。像是海岸阿美熟諳水性，因而被委派支援臺東線鐵道的橋墩建築工事，而此一工事是恆春阿美人一再避之、藉故推託的勞役工作。

本書論點固然新穎有趣，但筆者認為在此議題上，仍有若干可以深入討論的課題，故大膽提出如下淺見。首先是，作者認為阿美族之所以成為日本當局在東臺灣尋求勞動力時的首選，正因阿美族人數眾多，且擁有優越的體能，加上溫和的民族性，以及居所的易達性。但同樣被日本當局「強制苦力出役」的東部蕃人不在少數，如卑南人和布農人都有與阿美人同樣的「強制苦力出役」歷史經驗。由此可見，關於「強制苦力出役」制度的相關研究仍有待開拓；如此一來，才能顯現阿美族被勞役的特殊性與族群性。尤其是，同與阿美族一起劃歸普通行政區的「平地蕃」卑南族，在日本統治者眼中亦是順從的民族，與阿美族的勞役經驗有何不同？而所從事的工作項目相同嗎？日本當局動員與創造卑南族人「勞動力」的方式與阿美族人有何不同？此亦凸顯出有關國家將阿美族與卑南族劃歸「平地蕃」的理蕃政策研究，是目前學界所較少論及的。

其次，作者的口訪地區為今臺東縣的池上鄉、鹿野鄉、卑南鄉與成功鎮，這些鄉鎮大多屬恆春阿美或馬蘭阿美的範疇；而作者雖提及不同區域阿美族人的勞動情形、經驗，甚至記憶方式等差異，

但討論仍以恆春阿美為主，尤其著重於 Parayapay 部落。另外，作者使用的史料多所集中於臺東廳，較少花蓮廳的資料，但書名卻是涵括整個東部臺灣的阿美族人。或許是史料的限制與寫作精力的考量，而不得不有所取捨，但作者若能兼顧阿美族各地域群的討論，必定能使本文的論述和案例說明更為豐富，亦能凸顯阿美族的地域特色與差異。

最後，關於作者對傳統領域的認定問題，也是筆者所困惑的。因為此一問題涉及到本文最重要的論點之一——「土地圈奪」。作者是將〈原案〉中的土地利用規劃，與阿美族的傳統領域圖相互套疊後得出的論點；但由作者使用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地圖集」》資料，並無法看出是哪個時代的傳統領域，而此一區域也可能與其他部族的傳統領域有重疊之虞，因此在所謂的「傳統領域」認定，以及限縮阿美族人原有生活空間等面向的討論上，應多加著墨與細緻的處理。

綜合而論，本書雖有上述筆者提出的疑問，但仍瑕不掩瑜，無損於本書的魅力與可讀性。作者重建了阿美族人在東臺灣開發過程中的勞動歷史，有助於建構更多元的族群歷史面貌，補充了過往以漢人、日本人為主的東臺灣開發史論述，以及阿美族研究中較為缺乏的恆春阿美人研究，⁶ 開拓出許多豐富的議題，亦帶給未來的研究者不少啟發和方向。

⁶ 郭祐慈，〈臺灣戰後阿美族研究之回顧與討論——以馬蘭阿美族為例〉，《漢學研究》26：2（2007.05），頁 12-13。